

石窟宗教符号的 “像教”研究

——云冈石窟的宗教社会学解读



SHIKU ZONGJIAO FUHAO DE
XIANGJIAO YANJIU
YUNGANG SHIKU DE ZONGJIAO SHEHUIXUE JIEDU

徐 婷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 (skq201508)

石窟宗教符号的 “像教”研究

——云冈石窟的宗教社会学解读

SHIKU ZONGJIAO FUHAO DE
XIANGJIAO YANJIU
YUNGANG SHIKU DE ZONGJIAO SHEHUIXUE JIEDU

徐 婷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春宁
责任校对:曾 鑫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窟宗教符号的“像教”研究 / 徐婷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14-8686-3

I. ①石… II. ①徐… III. ①云冈石窟—佛像—石刻
造像—研究 IV. ①K879.224②K87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7380 号

书名 石窟宗教符号的“像教”研究 云冈石窟的宗教社会学解读

著 者 徐 婷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 7 5614 8686 3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125
字 数 19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像教动因：宗教与社会的需求	(24)
第一节 像教产生的宗教逻辑	(24)
第二节 像教产生的社会背景	(37)
第三节 像教与社会诉求	(49)
第二章 像教投射之一：交往空间与分层差异	(71)
第一节 像教的空间特征及其宗教意义	(71)
第二节 窟制的信仰指向及其变迁	(78)
第三节 像教中的民族和社会分层	(85)
第三章 像教投射之二：信仰的行为规则	(120)
第一节 符号对秩序的合法化建构	(120)
第二节 像教对社会规则的传承	(132)
第四章 像教投射之三：信仰的文字佐证	(140)
第一节 造像题记的文本特征	(141)
第二节 造像题记的信仰特征	(150)
第五章 “教”、“像”的社会互动	(172)
第一节 “教”、“像”互动下的社会结构要点	(172)
第二节 像教对社会表意性规则的建构	(176)

第三节	像教对社会资源的建构·····	(178)
第四节	像教与社会的结构·····	(186)
结论和余论	·····	(196)
附 录	云冈石窟造像题记·····	(199)
参考文献	·····	(206)
后 记	·····	(224)

导 论

一、从佛教到“像教”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印度，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教义、教理博大精深，充满智慧和友善，在信仰社会中传播迅速。佛教在创立之初是没有佛像的。佛教记载，两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在世时反对印度婆罗门教的偶像崇拜，佛教徒们遵循了佛祖的教诲，故佛教在产生后的最初 600 年间没有佛像出现。公元 1 世纪之前，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公元前 272-232），摩诃菩提寺中塑造了佛座，那是关于佛陀的最早的象征形式，而佛像的出现则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关于历史上佛像诞生的时间有多种论断，研究者根据不同的考证、研究提出自己的判断，其中最早的说法认为佛像产生于公元 1 世纪左右^①。无论是在哪一种论断中，研究者都非常注重考察佛像中所具有的民族性特征。我国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是国内第一座石窟寺，洞内佛像所具有的雅利安人的面貌特征证明了佛教由东向西传播进入我国的传播路径。

^① 近年来关于佛像起源的研究，比较成熟的主要有 5 种观点：希腊影响说、秣菟罗起源说、罗马影响说、马歇尔说和高田休说。参见宫治召《近年来关于佛像起源的研究状况》，《敦煌研究》，2000 年第 2 期，74~82 页。

佛教传播的历史就是石窟造像发展的历史。自公元3世纪石窟艺术传入我国开始，石窟艺术就随着佛教的发展逐步延伸，直到公元13世纪，我国石窟的修建持续了10个世纪之久。在总体数量上，我国范围内“石窟群地点的总数约在1000处以上，而石窟洞和造像龕的数量很可能会超过10万”^①。这些石窟群分布在佛教传播的线路上，云冈石窟就坐落在佛教传播路线的北路：从古称犍陀罗（巴基斯坦北、阿富汗南）经由中亚，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西域（新疆），再经河西走廊抵达中土，古称“丝绸之路”。这一线上聚集了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等，是佛教艺术的重要传播线路。如果把全国的石窟寺分成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这三个大的自然区，则云冈石窟处于中原华北地区。公元5至8世纪，这里是中国石窟发展高峰期的中心区域，遍布采用石雕刻的手法制作的佛教造像。佛教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与佛像的传播和教化作用密不可分。如果说，佛教在东进^②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那么语言的障碍就是最大的阻碍。4世纪以前的译经活动还不频繁，佛经还没有真正起到主要的传播作用，此时，佛像无疑发挥了很重要的传播作用。汉武帝夜梦金人的记载充分说明了佛像的这一功能：

（汉武帝）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

① 常青 《佛祖真容——中国石窟寺探秘》，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② 阎文儒 《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阎先生认为拜城克孜尔的窟群，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子克拉罕等窟群的雕刻、壁画的题材内容和窟形，以及甘肃地区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到天水麦积崖的造像和壁画的题材风格有着前后相继的关系，证明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路线是由西向东发展的。

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之跪拜，自此始也。^①

佛像进入中国以后，佛教渐渐被人们所认识。随着译经活动的逐渐开展，在“像”和“教”相互推动下，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广泛传播流行，佛像的建造也普遍化和规模化，佛像以像宏教的功能也愈发强大，奠定了“像教”的角色性地位。北魏时期，“像教”已成为佛教传播、教化和信仰的主要方式。

二、石窟造像研究的多学科研究传统

石窟造像是雕塑的一种。在雕塑史上，从远古的器物雕塑开始到现代装饰性雕塑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石窟造像在我国雕塑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其数量众多；另一方面，大型石窟造像的开凿往往耗费庞大的物资，动用众多优秀的技师与匠师。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个时代财力和智力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时代历史真实的记录，因此，石窟造像具有历史的意义和内涵。佛教石窟造像随着佛教艺术的发展而产生，造像所承载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是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见证，造像所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一个时代和民族的审美情趣的物证，因此，石窟造像也具有艺术的特征与意义。此外，无论是与先秦器物雕塑、纪念仪卫雕塑相比，还是与随葬明器雕塑、赏玩装饰性雕塑相较，石窟造像都具有其他雕塑形式所没有的特殊性——它具有人类群体性信仰的特征。它的出现使雕塑开始具有宗教信仰的内涵与意义。石窟造像不同于一般艺术品。石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窟艺术伴随了佛教自身的发生和发展，以艺术的形式记录了佛教的历史，它所蕴含的象征内容是特定时代形而上的宗教精神生活的凝练。石窟造像是宗教崇拜的对象，对造像的供奉就是对佛的供养，造像承载了宗教信仰群体的宗教情感，显示着人类宗教精神的世界的生活；造像所蕴含的宗教内容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对于宇宙、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终极理解；石窟造像是宗教信仰的符号化，因此可以说，石窟造像同时具有历史、艺术、宗教的特征和意义。

在石窟造像的研究上，主要存在3种传统的研究视角：历史学的、宗教学的和艺术学的视角。历史学的研究将对象视为文物，从历史考证出发，考察对象的时间、地点、发生、发展等客观属性，还原对象的本来面貌；宗教学的研究，以宗教文本为参照对象，研究造像对于文本的具体阐释及其在宗教发生发展上的阶段性特征；艺术学的研究，则将对象作为艺术的发展成果，探讨其表现手法及在艺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三种视角的理论框架内，形成了诸多的研究成果。

作者将研究对象设定为云冈石窟造像，是由于云冈石窟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云冈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与敦煌石窟和龙门石窟齐名，是第一个全部以石雕造像为内容的大型石窟群，石窟特征最为鲜明。云冈石窟地处山西省大同市西，古时的大同是北魏的都城“平城”，是北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从北魏皇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公元398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云冈石窟的主体部分得以修建，时代性特征显著。从佛教传入的地理线路上看，平城地处北传佛教向东传播的线路上，是佛教石窟艺术由西向东发展线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佛教发展的时间向度上看，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以来，经过前期的传播和发展后，在北魏时期进入

“佛教中国化”^①进程的加速时期。云冈石窟造像是这一时期北方宗教发展的见证者，是“像教”的典型代表。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谈到北朝造像是这样形容的：“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为北朝佛法之特征。”^②他用“造像立寺”四字概括出了北朝佛教信仰的特征。北魏时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信仰之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统治阶层，下至贫民老百姓，皆参与到造像活动当中来。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佛教造像运动都不曾涉及如此广泛的社会层面。北魏佛教对于社会的影响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发展成为“像教”的，体现出像由教生、教因像显的宗教逻辑。

此外，云冈石窟主体的修建时期正是太武帝灭佛后的佛教恢复时期，时代特征明显。北魏平城时期又是拓跋鲜卑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段，当时居民成份复杂，宗教造像活动与政治、民族、经济、文化密切相关，以宗教面貌出现的云冈石窟与社会系统的其他要素处于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因此，对云冈石窟进行宗教社会学研究具有“像教”研究的典型意义。

国外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的《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1903年）。日本考古界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

^① “所谓佛教中国化是指，印度佛教在输入过程中，一方面是佛教学者从大量经典文献中精炼、筛选出佛教思想的精神、内核，确定出适应国情的礼仪制度和修持方式，一方面使之与固有的文化相融合，并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也就是佛教日益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适应、结合，形成独具本地区特色的宗教，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面貌的特征。”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载《方立天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页。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5~366页。

兴趣由来已久，此后，又先后有木下木工、关野贞、常盘大定、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正雄、冢本善隆等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石窟的修建年代和功能做出考证，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石窟考证方面的论作，如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的《山西云冈》、冢本善隆的《“沙门统”昙曜年代考》等。其中，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合作发表的《云冈石窟》16卷本（1951年）是当时最为全面的论著，迄今国内仅存3套，但尚无中文译本，实属憾事。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学者沙腕、夏凡诺对云冈石窟也做过考察并做出早期图解。外国学者对石窟的研究兴趣促进了国内学者对石窟的关注。

国内学者中对云冈石窟最早展开研究的是陈垣先生。他在大量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云冈石窟寺作出论断。袁希涛、周一良、白志谦、赵邦彦、宿白等对石窟佛像、碑记、分期等问题相继作出了研究和考证。还有更多的学者对石窟的研究更加具体，如戴蕃豫、常任侠、阎文儒、王恒等对石窟佛教艺术的研究，郝树侯、李治国、丁明夷、陆屹峰、员海瑞、李雪芹等对云冈历史的研究，宿白、赵一德、殷宪对云冈石窟文化的研究，叶恭绰、周肇祥、周伟洲、刘建军等对题记的考证研究，肖兴华对石窟乐器的民族学研究，张焯对与石窟相关历史人物作出的考证，以及赵昆雨、李雪芹对造像服饰的研究等。此外，在建筑学方面的研究也有部分成果问世，如梁思成、林徽因对云冈北魏建筑的研究、王恒对石窟瓦顶建筑式样的研究等。

关于宗教的符号学研究目前国内虽然起步较晚，但已有了一些研究成果。詹石窗先生首先将符号学方法应用于道教研究，发表了有关道教符号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道教符号的艺术象征》^①中，他在对道教符号分类的基础上，阐明了道教生命意

^①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识通过符号的象征作用而得以传递的机制；在《道教符号刍议》^①中，他指出道教符号系统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关系；在《符号学在宗教研究中的应用初探》^②中，他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符号学在宗教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对宗教的符号学分类做出了重要的论述；在《论道教神仙形象与易学符号之关系》^③中，他勾勒出“易”与整个道教神仙体系的“符号学”的对应关系。唐小蓉的《图像中的信仰和信仰中的图像——藏传佛教六道轮回图释义》^④在通论意义上对佛教人神鬼的三维世界观做出了理论模型，对藏传佛教六道轮回的因果循环做出了理论解释。此外，孙凡的《全真道仪式音乐的符号意义》^⑤从音乐符号学的研究角度指出，全真教音乐符号表达出敬畏之情、清净之心和中和之意。

对佛教的符号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佛教石窟的研究上。在中国三大石窟群当中，学界最为看重敦煌石窟的学术价值，对这一研究对象投入了很多的关注和精力，成果也最为丰富。例如，梁晓鹏的《莫高窟第254窟千佛文本的符号学分析》、《莫高窟千佛图像的符号学分析》^⑥，岳峰的《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壁画艺术符号研究》^⑦，都是在艺术学研究的范围之内运用符号学方法对于平面图像进行研究的成果。此外，还有从旅游的研究角度探讨石窟的，如李宁的《宗教符号的功能认知——旅游者同宗教信徒的不同视角》^⑧探讨了旅游者和信徒对宗教符号的不同解

① 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载《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3期。

③ 载《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④ 载《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

⑤ 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⑥ 分别载于《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和2006年第2期。

⑦ 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⑧ 东北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读视角，阐明了符号的多义性。

纵观之，对石窟造像的现有研究是在考古学、艺术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学科角度上进行的，而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对石窟造像进行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石窟造像具有意义的复合结构，使用单一学科的视角分析显然不利于全面、科学地把握研究对象。

三、石窟造像研究的宗教社会学路线

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石窟造像是信仰者的内心观念在身外世界的投射与反映，是信仰者内在精神世界的外在物质显现。造像以符号的形式记载了信仰者的信仰内容，并在造像的物像形式中凝聚了佛教信仰社会的特征和信息。因为石窟造像活动不但是社会生活中的宗教行为，也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相关联，相互交织、密不可分，所以，石窟造像不是单纯的宗教现象或艺术成果，而是与构成先民精神、物质生活的社会系统中其他要素相关联的社会生活。目前，国内外对宗教造像的研究，在宗教、艺术、历史学科中已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缺少严格意义上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宗教造像与社会关系的专门成果。“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果没有被放在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考察，任何一方面也无法被理解。”^①综合性学科视角的缺失，显然不利于我们对石窟造像形成全面、系统的把握。所以，对云冈石窟造像进行宗教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宗教的社会本质，理论家们有着独到的见解。马克思对

^① 转引自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 页。

宗教有过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①。在颠倒的世界里，“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②，这种“幻想的现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他尖锐地指出了宗教对人自由的剥夺。马克思将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他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从阶级的角度出发认识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

实际上，宗教是包括了观念、组织、情感、行为的复杂体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已然超越社会、政治、经济的范畴。杜尔凯姆将宗教理解为与神圣物有关的信仰和实践。他由原始宗教展开研究，去发现和论证宗教的社会性。他认为“宗教表象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述……如果种种概念起源于宗教，那么它们必然分有一切宗教共有的因素，而且也必然具有社会性。”^③但是，由于他的研究“局限于差别极其细微的社会，这也就阻碍了他在确认其‘种种表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那种联系，是否也适用于更加复杂的社会”^④。韦伯将宗教描述为“调节人类生存的体系”。他研究的关注点是“某种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发展的影响，或者说对于一种经济体系之社会精神气质的影响”^⑤。他通过对于教派的考察，论证了基督教伦理精神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重点关注对群体宗教行为的研究。

笔者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石窟造像是现实世界信仰者的宗教行为结果，也是信仰者对信仰世界的符号化建构。在宗教社会学视野下的“像教”研究，应当超越社会、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2页。

③ 转引自【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宗教社会学史》，高师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5页。

④ 【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宗教社会学史》，第78页。

⑤ 【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宗教社会学史》，第78页。

治、经济的藩篱，形成对于“像教”信仰的全面、科学的把握。故本书对佛教石窟研究，从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传统出发，坚持宗教的本质在于人自身的基本观点，“用宗教作为钥匙去理解生命”^①，通过石窟造像的宗教社会学解读去把握人的宗教社会生活。

从根本上说，造像是对宗教经典的符号表达。对造像的研究就是对宗教符号的解读。符号学^②认为，一切符号在意义指向上都具有“能指”和“所指”的区别。造像符号的“能指”是佛教经典中的既定内容，“所指”则蕴含了“像教”社会的信息。这构成了对造像符号意义的两种解读方式：宗教学与社会学的解读。“能指”是前者的研究对象，而“所指”属于后者的研究领域。本研究试图在运用符号学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石窟造像在宗教、艺术、历史等学科研究的成果，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探讨符号的“所指”意义世界，对云冈石窟做出宗教社会学角度的解读。通过这一尝试性的研究，本书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宗教社会学视角下的“像教”具有怎样的特征？“像”与“教”具有怎样的关系？“像”与“教”之间具有怎样的互动作用？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将构成本书“像教”论的主要观点。

（一）符号学视域下的云冈石窟

本研究是基于对符号学基本理论运用和对石窟宗教符号学分

① 【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宗教社会学史》，第12页。

② 符号学是20世纪的主流思潮之一，在西方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是知识分子反省自身载体工具的主流。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是符号学发展的巨大成就，它源自于索绪尔的语言学、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符号学直接孕育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其反现代主义、反城市工业主义的主张，旨在瓦解符号虚构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现出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狭义的符号学，一般仅指符号学的方法，此处的符号学是指狭义意义上的符号学。

类下的研究。

德国思想家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他认为创造符号和使用符号是人所特有的活动,不同的符号形态构成人类生活的不同世界,而人类文化、文明的诸形态是人类符号活动的显现。石窟造像即是卡西尔所说的符号形态之一,在符号的创作过程中,创作者用具体的雕塑形象承载他们的宗教思想意识,雕塑又以直观的符号形式展现在观者面前,表达与传递意义。

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符号构成理论。索绪尔认为,符号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符号呈现的形式,即“能指”;二是符号再现的观念,即“所指”^①。皮尔斯认为,符号的构成有三部分的内容:符号采纳的形式,即“再现”;符号组成的感觉或意义,即“解释”;符号所指的事物,即“物象”。皮尔斯在索绪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意义阐释者的能动的创造性作用。不论是哪种观点,都涵盖了符号所具有的两层最基本的结构:形式与意义。对于宗教造像而言,其符号同样具有双重的结构,造像符号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联是通过象征过程来完成的。“象征”在古希腊文中原本是指一件器物,比如木板,分成两半,两个朋友各执一半,再次见面时合成一块以示友爱,于是木板成为友爱的信物。由此器物被引申为某种观念的代表。因此,“象征”意味着意义的转换,象征物在这种转换中被赋予了原本所不具有的某种意义。造像符号是通过象征过程来传递意义,从而实现对人的意义表达的;同样,观者也是在造像符号的指示下实现对意义的理解的。象征的方法原本是文艺创作的一种手法,“它通过某

^①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00 页。

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表现与之相近或相似的概念、思想和感情。象征形象由于反复使用，便逐渐带上了相对稳定的象征意义。”^①在宗教艺术的领域里，宗教符号的象征意义同样具有稳定性，这成为宗教象征系统得以建立的条件之一。并且，宗教造像符号的象征意义只有在特定的宗教象征系统中才具有这种稳定性，在同一象征系统中，同类的符号具有意义结构的相似性。

詹石窗先生认为，对宗教符号进行分类是符号学研究的基础，不同的标准下宗教有不同的分类。他首次从符号学的角度给予宗教以明确的类型划分：如果以宗教符号象征意义的认可范围为标准，宗教形态可分为地区性符号意义的宗教形态和世界性符号意义的宗教形态（后者包括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宗教形态是由一定的宗教元素组合而成的，各种宗教元素可以看成是符号单元或者记号群体。由此，在同一宗教形态下，宗教符号元素又可划分成为宗教的语言符号元素、非语言符号元素和混合型符号元素三种。宗教的语言符号元素，顾名思义，主要是指以口头或书面语言为表达方式的宗教语言符号；宗教的非语言符号元素包括非语言的符号元素（如神鸟）和非语言的人工符号元素（如庙宇、法器）；宗教的混合型符号元素同时兼有语言符号元素和非语言符号元素的特征，它以宗教仪式作为分类代表。

云冈石窟是符号的复合系统，包含了两种宗教符号元素：非语言符号元素和语言符号元素。其中，非语言符号元素由以下两种形式存在的符号构成，一种是信仰空间符号，主要包括石窟所依附的武周山和大大小小的石窟；另一种是石窟表形符号，包括了云冈以佛教人物、动物等为主题的各类佛教造像。云冈石窟语言符号元素主要是指以文字雕刻形式留存的文字符号，即造像题

^①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高教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 页。